



首页 → 学术文章 → 政治伦理

高振杨、刘祖云：浅谈“管理伦理”诸学科的逻辑演进

浅谈“管理伦理”诸学科的逻辑演进

高振杨 刘祖云

摘要：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元学科，发端于企业伦理的兴起，拓展于政府管理领域的行政伦理。经过公共伦理的瑕扰之后，最终公共管理伦理登上了管理伦理演进的舞台。这一复杂的过程正反映了管理伦理诸学科的演进史，也揭示了管理伦理元学科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管理伦理；企业伦理；行政伦理；公共伦理；公共管理伦理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与伦理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最初发端于企业管理伦理，简称企业伦理，当前国内外学界通常将企业伦理学代之以管理伦理学。这主要是因为，以往的管理理论主要限定在企业管理领域，正如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P.F.德鲁克所说：“我们今天倾向于认为，管理就是企业管理。”^[1]但本文所要论述的管理伦理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伦理，而非狭义的管理伦理，即企业伦理。这里的管理伦理是一般管理学（而非特指企业管理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全新的元概念，也是一门全新的元学科。根据涉及管理领域的不同，管理伦理可以划分为企业伦理、行政伦理、公共管理伦理等等。

一、企业伦理——管理伦理在企业组织的发端

（一）企业伦理的兴起 管理伦理之所以发端于企业管理伦理，主要是因为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首先得到了管理者的关注和探讨，从而引起了伦理学工作者的兴趣。企业伦理学，或曰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最早于1962年出现在美国，以美国政府迫于压力公布的有关企业丑闻的一个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A Statement on Business Ethics and a Call for Action）为标志，但其学科正式确立的标志却是于1974年11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讨论会。^[2]若是以弗雷德里克·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为现代管理的理论起源，企业伦理整整滞后大半个世纪才被学界正式提出并得到承认，这主要是缘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1. 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列“经济丑闻”、“企业丑闻”是企业伦理得以发掘的直接原因。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列的“经济丑闻”、“企业丑闻”，诸如飞机采办中的行贿受贿、化学工厂中的有毒气体的大爆炸、对河流和海洋的大批污染、食物污染、汽车走私、非法武器出口等经济丑闻。这些主要涉及企业的经济丑闻迫使人们进行反思，开始研究、探讨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不断发掘企业管理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企图以伦理的手段改造以往纯粹工具理性的企业管理，克服企业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2. 传统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经过长期的范式演进逐渐向管理伦理方向靠拢。一方面，现代管理科学经过“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时代直到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3]其每一项管理活动与决策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从最初的纯粹“机器人”、“经济人”假设，到后来的“社会人”、“复杂人”假设，从最初强调硬性控制与物质激励，到后来注重价值导向、情感满足与文化认同，这些管理理论范式的演进无疑正是朝着管理伦理方向前进的；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领域，西方国家的企业同样面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将东方人文精

神与西方管理理论有机融合的东方企业管理模式开始引起西方企业的反思，如何将科学原则与伦理精神融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开始成为西方企业管理改革普遍的探索方向之一。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伦理开始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发展。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个人之间，例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事、销售者与消费者等之间的个人伦理关系问题；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宏观层面，主要是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上（例如经济制度、环境政策等）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企业伦理相关理论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到“道德决策模型”（哈罗德·孔茨，1988），以及现在颇为流行的“企业文化”理论，可以说企业伦理的相关理论变化之迅、发展之快，都凸现了企业伦理蓬勃的生命力，也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伦理的影响

1. 引发企业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企业伦理发展的现实影响。企业伦理得以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引发了企业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变革。价值因素、道德与伦理被重新引入到企业管理理念之中，取代了以往纯粹工具理性、强调价值中立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方式也开始出现伦理化倾向，“以人为本”开始成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追求利润开始与追求理想相结合，注重构建企业特有的价值观，强调文化因素发挥独特作用的“柔性管理”。

2. 将管理学与伦理学相融合，开启管理伦理研究的序幕是企业伦理兴起的学科意义所在。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元学科，自然不仅仅是指企业伦理，除此之外，还应包括行政伦理、公共管理伦理等其他管理领域的伦理学。但不能否认的是，企业伦理是整个管理伦理研究的发端，是最先将伦理视角引入管理领域的一种创新性尝试，为其他管理领域的伦理发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开启了整个管理伦理元学科的架构序幕，有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发展意义。

3. 企业伦理的发展为其他管理伦理特别是行政伦理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理论借鉴。这也是企业伦理学科意义的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在其推动行政伦理发展方面。正如企业管理理论与行政管理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一样，企业伦理与行政伦理同样存在着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趋势，但就现实而言，企业伦理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这也主要得益于企业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迫使其管理不断改革创新，进而企业伦理的相关理论发展相对较快。这也就为行政伦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特别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之中，政府行政人员的“经济人假设”、“顾客满意导向”等充满伦理价值因素的管理创新，其灵感大多缘于企业伦理的创新与发展。

二、行政伦理——管理伦理在政府领域的拓展

（一）行政伦理的兴起 行政伦理相关思想古已有之，例如我国传统道德中的“忠”、“信”、“廉”、“智”等都是服务于古代传统“德治”行政的。但将行政伦理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陈述，特别是从学科的角度系统研究行政伦理也只是始于上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国家，我国的行政伦理系统探索则更为晚近，主要开始于本世纪初。在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当然离不开上述企业伦理发展的影响与推动，这也是行政伦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以兴起的前提之一。但将管理伦理发展的触角延伸至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领域，实现管理伦理在政府领域的拓展，行政伦理的发展同样有着其特有的原因：一是缘于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对行政管理提出的严重挑战，行政伦理成为除表面化、外在化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手段之外抑制腐败的重要手段。接连不断的政治丑闻使政府官员的道德作风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大问题，在权力制约失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求伦理救治。

二是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逻辑必然。在西方行政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强调的是行政管理的工具理性和技术问题，即行政的科学性和效率。早期的行政学家们都认为行政管理应祛除主观判断，维持价值中立，以追求经济与效率为目标，忽略行政管理的价值理性和价值问题。随着行政学的发展，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的目光再次回归到政治学寻找行政管理的价值理性的光芒，以谈论价值问题为宗旨的行政伦理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此外，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还主要得益于一系列行政改革运动的推动。“新公共行政运动”把西蒙在管理中考虑的价值因素的前提明确化为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从而提出了对政府公共行政行为进行伦理考察和价值定位的可能性，即建立行政伦理学的可能性；“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模糊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界限的同时，也突出了公共管理的

公共特性（价值定位和价值属性），并悄悄地把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放在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从而为建构行政伦理的理论体系和行政伦理问题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和方案。”[4]总的来说，行政伦理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来进行：一是从目的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实现公正与正义，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二是功能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培养行政人员人格，塑造德性行政的途径；三是从工具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手段与方法。

[5]

（二）行政伦理的历史局限性 行政伦理是管理伦理引入公共部门领域的第一步，无疑有着巨大的开创意义。即使在今天，行政伦理仍然有着其重要的发展价值，应有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但行政伦理却不是管理伦理在公共领域发展的终极形式，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今天，行政伦理同样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单一的行政责任倾向制约了行政伦理研究的全面发展。传统的行政学学科体系构成中，行政伦理学在本质上与学科整体有着不相容性，但是，由于实践的需要，逻辑上的不相容性向实践中的现实要求作出了妥协，才会出现行政伦理这门学科。而这种妥协的代价却是，“逻辑上的不相容性严重约束和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使它永远处于边缘地位，而在学科内容上也主要是关于行政责任的伦理规定，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讲是远远不够的。”[6]实际上，现有的行政伦理研究主要是以行政责任为切入点，将行政伦理仅看作行政责任实现的有效途径，缺乏行政伦理其他方面的积极构建与创新，这种单一的责任取向已经制约了行政伦理的全面发展。

二是，行政伦理面临行政学范式转换的压力，其公共性有待延展。行政伦理学作为公共行政学与伦理学相融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行政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众所周知，行政学或曰公共行政学在经历了“威尔逊—韦伯范式”、“西蒙决策范式”之后，正由上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之下，向着“公共管理范式”转换。虽然目前公共管理范式尚未完全确立，这主要是因为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所造成的，局部的理论仍存在争议甚至是相互冲突，但其所代表的变革方向仍然是得到国内外学界一致认同的。也即，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行政模式，而是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公共部门在内的政府与公民社会以及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因此，行政伦理以政府为研究主体的视角显然不能涵盖整个公共管理范畴，即使就政府行政而言，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行政实质是一种“服务行政”，明显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管理行政”，“服务”之于“管理”反映了核心价值的转变，实质是一种公共性的延伸，因此以往以管理行政为研究对象的行政伦理同样应继续其自身的范式转换，以延展其公共属性。

三、公共伦理——行政伦理公共性的逻辑延展

（一）公共伦理的提出 正如前文所述，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将管理伦理研究从企业的私营部门管理领域带入到政府这一公共领域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伦理公共性延展进程的结束，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着“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管理伦理研究开始涉及除政府以外等其它公共部门管理的领域，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公共伦理”开始被人们提及。然而对公共伦理这一概念，国内学术界至今还有着不同的界定。一是，局限在公共伦理的一般意义上构建公共伦理学，认为公共伦理的内涵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的道德规范——社会公德”[7]。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伦理”只调节人类生活三大领域（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二是，将其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这一概念的界定突出了公共伦理的“公共性”，如学者李萍认为公共伦理研究对象主要是公共行政活动，特别是那些具有显著道德意义的公共行政活动，如公共决策、公共参与、社会福利等，其实质是一种组织伦理，而非个人伦理，是一种互动伦理，而非静止的单向伦理，其任务在于分析公共行政中出现的重大伦理维度。三是，将其理解为公共管理伦理，如有学者提出公共伦理又称为公共管理伦理，是指以公共管理系统为主体或以公共管理者为主体，针对公共管理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认为公共伦理又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主要包括体制伦理、政策伦理和职业伦理三种类型。[8]而高力教授则认为，所谓公共伦理就是用以规范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公共事业的公正性，合理有效地实现公益事业目标的价值准则体系。[9]从上述对于公共伦理概念的理解来看，将公共伦理理解成公共管理伦理成为主流现象，这也反映了管理伦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演进趋势，迫切需要对传统行政伦理研究进行范式转换，以继续推进管理伦理的公共性延展。但同样也存在对公共伦理的其他理解，这也成为学界诸多学者质疑公共伦理的切入点，使得公共伦理成为争议的焦点。

（二）对“公共伦理”的质疑

1. 伦理没有公共伦理与私人伦理之区别，一切伦理都是公共的。张康之教授认为，虽然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有着属于自己领域的特殊的伦理，但就伦理而言，没有“公共伦理”与“私人伦理”的区别。道德有“公德”和“私德”的差别，但无法辨别哪些伦理是公共的哪些伦理是私人的，“私人生活中有伦理，但决不是私人伦理；同样道理，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如果被直接呼为公共伦理也会让人摸不着头脑。”^[10]

2. 公共伦理这一概念很容易引起误解，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学科意义。上述对于公共伦理的三种理解中，从一般意义上对公共伦理进行解释，将公共伦理等同于全体公民都需遵守的社会公德。这样的误解使得公共伦理沦为一般道德中的社会公德，与管理伦理演进过程中所应保持的职业伦理特性相背离，因为任何领域的特定职业伦理一般其底线都要高于一般社会公德。所以，若是公共伦理等同于社会公德，其就失去了管理伦理元学科框架内学科演进的意义。

3. 公共伦理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同样面临学科范式转换的压力。即使将公共伦理与一般社会公德严格区分，将其限定在管理伦理的架构之内，仍然面临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的可能。这样，公共行政伦理仍然属于行政伦理研究，即仍然是以政府行政为研究对象，属于管理行政的学科范式，在急需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今天，“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压力依然会迫使公共行政伦理继续其范式转换，这样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的“公共伦理”依然停留在行政伦理研究阶段，进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学科演进意义。

四、公共管理伦理——公共伦理的理论矫正

(一) 公共管理伦理兴起的背景 公共管理伦理是以公共管理学为元理论，运用伦理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实践行为的规范问题的知识体系。^[11]其国内理论研究主要始于本世纪初，出现一批研究公共管理伦理的学术论文和以公共管理伦理学命名的教材与专著，标志着我国的公共管理伦理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公共管理伦理研究之所以开始在我国兴起，有其特有的时代背景。

1. 我国政府持续推进的行政改革运动构成了公共管理伦理研究发展的现实动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引导之下稳步推进，作为宏观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更是作为改革的重点加以优先推进，迄今为止经历了5轮较大的政府管理体制变革。一方面，向西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学习，注重理性官僚制的构建，强调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论与成功经验，强调高效、廉洁、透明、责任以及服务政府的建设，积极推动政府行政向公共管理模式转变。但行政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同样面临诸多的问题，例如权力滥用、官员腐败、公共服务缺失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伦理的视角，希望构建全新的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以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行为。

2. 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范式转换成为公共管理伦理得以发展的学科前提。公共管理伦理是以公共管理学为元理论，运用伦理学的原理来研究管理实践行为规范问题的知识体系。没有其元理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自然也就不会有公共管理伦理研究的兴起。受西方国家行政研究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引入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并进行研究和创新，使得公共管理学在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公共管理已经在我国行政学研究中牢固确立了其主流范式的地位。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自然也就为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使得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成为可能。当然，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完善也需要发展公共管理伦理研究，作为其分支学科之一，公共管理伦理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地位。

3. 以德治国的我党执政理念为公共管理伦理发展提供了不竭的观念动力。在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的同时，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宏伟战略，这是一种执政理念的体现。德治的核心是强调伦理、道德等价值因素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实际上与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我党将德治的执政理念贯彻到政府等公共部门的社会治理之中，注重德治与法治、权治的有机结合，必然会推动公共治理中各种伦理观念的发展，为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提供不竭的观念动力。

(二) 公共管理伦理初显端倪 公共管理伦理的出现，是对公共伦理的一种理论矫正，也是对行政伦理的一种范式替代。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处于管理伦理元学科的框架之内，是管理伦理在公共管理领域

的理论继承与创新。之所以说是理论继承，是因为它仍然没有脱离企业伦理与行政伦理的影响，需要吸收借鉴后者有益的发展成果；之所以说是理论创新，主要是因为它对行政伦理的范式替代，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平台，其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明显区别于企业伦理与行政伦理。与传统所有的职业伦理学不同，公共管理伦理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工作。[12]公共管理的独特根据不是分工而是分群，也即公共管理得以产生的时代已经不是一个需要通过分工来理解社会分群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通过社会分群来理解分工的时代。公共管理的对象有些是由于分工造成的，但更多则是由于非分工因素造成的社会分群。而公共管理恰恰是客体中心主义的，明显不同于传统行政管理的主体中心主义，其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整合，追求社会的群际和谐，也包括公共管理主体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伦理也有着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公共管理伦理突破了行政伦理单一的政府主体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公共管理部门，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在研究内容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所要认识的是公共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之间、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国家或政府权力结构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为公共管理行为提供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而实现整个公共管理制度和体系的伦理化。[13]简言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的服务精神及其作为支持力量得到的生成和保障机制。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公共管理伦理研究采用利益分析视角，将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整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看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协调利益冲突的公共管理主体道德化机制。此外，公共管理伦理学主要采用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依据历史主义方法，强调集体主义原则，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且注重现实主义分析，将个人置于静态的历史截面之中，以个人利益为原点进行理论思考，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制定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方案。总之，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元学科，发端于企业伦理研究的兴起，然后逐渐在政府管理领域拓展，以致形成特有的行政伦理学科领域。而行政伦理并不代表管理伦理在公共管理领域演进的终极形式，在经过公共伦理的瑕扰之后，最终公共管理伦理登上了管理伦理演进的舞台。从最初的企业伦理到目前的公共管理伦理这一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正反映了管理伦理诸学科的演进历史，也揭示了管理伦理元学科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 P.F.德鲁克.管理的新范式[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2）（3）.[2] 祝木伟，宋阳.管理伦理研究简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3] 戴木才.西方管理伦理的发展趋势[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2）.[4] 戴木才等.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与研究视界[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7（2）.[5] 刘祖云.行政伦理何以可能：研究进路与反思[J].江海学刊，2005，（1）.[6]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序第2页.[7] 董建新.解析行政伦理[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204（3）.[8] 邹俊、张芳.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公共伦理视角[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1）.[9] 高力.公共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10]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1] 张文芳.初探公共管理伦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2，16（4）.[12]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J].东南学术，2002（5）.[13]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

原载于《攀登》2007年第二期